

国家专款能否给高校留“自由”

■本报记者 袁一雪 陈彬

两会前夕,教育部公布的一组数字,体现了国家对贫困生问题的高度重视——2018年,全国累计资助不同教育层次的在校大学生9801.48万人次,总资助金额达2042.95亿元,比上年增加160.81亿元,增幅8.54%。

全国一盘棋,陕西省也不例外。数据显示,2018年度,陕西省资助学生至大学研究生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超过405万人次,资助金额超过50亿元,其中本专科与研究生资助款项数额超过了2亿元。

作为来自陕西省的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工程大学校长高岭,对于陕西省高校的扶贫工作也颇有感触,但作为一校之长,高岭对于针对高校贫困生设立的国家助学金应用还有着更多期待。

使用空间不足,学校发挥余地小

据高岭介绍,“国家助学金”设立于2010年。该项资金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其无论是资助学生的具体数量,还是每名学生的具体资助金额,全部由国家规定,高校只需照章办事。

“这样的做法虽然杜绝了‘雁过拔毛’的贪污行为,将每一笔款项如数发给每位申请资助的学生,但是一旦遇到意外情况,高校也无法及时调整,还需要层层上报。”高岭说,例如,有时学校可能会遇到申请资金下发后,申请人已经退学或从军的情况。此时,这笔钱就会成为“死钱”,高校不能动,如果再重新申请,则所需手续颇为繁琐。

此外,目前国家助学金按照学年申请和评审,有些研究生的助学金固定分三年发放。但事实上,有些专业的研究生学制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多余助学金如不能发放到个人,学校也无法将其用在其他贫困生资助项目中。

目中。“所以,助学金使用中,能否给高校多留出些空间?”高岭表示。

对于这些情况,多年在基层负责学校贫困补助申请与发放工作的某高校教师蒋亚楠有着另外的解释。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她坦言,如果要更改已经申报成功的被资助对象,其申报过程确实时间较长。但她同时表示,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因为一般申请补助时间多为10月,但是当兵或退休的学生往往在9月便已确定。即便真的出现个例,我们也会从学校的数据库中调取其他需要资助的学生。”蒋亚楠说。

不过,对于学校使用资金空间的问题,蒋亚楠也有同样的感受。

“按照规定,国家助学金的总数是根据每个高校的总人口数确定的,而实际上,大学生的贫困人口数每年都在发生变化,高校的贫困人口与国家助学金有时并不十分对等。如果国家拨款多于申请的贫困人数,多余款项受限于‘专款专用’,高校很难及时为其他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资助。”蒋亚楠说。

公开没问题,如何保证公平公正

在高岭看来,在助学金发放的问题上,国家可以“抓大放小”。

“国家对于助学资金的投入,体现了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值得称赞。但如果要求高校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不给任何调整空间,则可能会令学校产生一些不适应。”他说,毕竟每所高校的情况不一样。

那么,能否让高校有更多使用专用款项的空间?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专款专用是国家财政部门和相关拨款单位的规定,这样能更好地保证资金

的使用,但专款专用想要落到实处,最大的难题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受资助对象,这是需要高校本身多下功夫的,也是如蒋亚楠这样的具体工作人员最为苦恼的。因为“在选择资助对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做到绝对‘公开’,但要保证绝对公平、公正还需要继续摸索”。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教师连洁平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曾对此做出过解释:对于高校贫困生资助中的关键词——贫困生,目前国家层面的政策文本中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其认定工作中,也存在难以操作的问题。这些都给工作带来不便。

此外,目前高校的贫困生认定工作,通常由负责确定班级贫困生及受助学生名单的认定评议小组、负责审核名单的认定工作小组,以及负责全面领导相关工作的领导工作小组共同完成。而在实际工作中,三个小组所负责的评定程序是单向的,每个环节所认定评议的结果缺少科学、合理的监督和检验。

能否“分批下发”

除资助对象甄选的问题,对学生补助使用情况的监督,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2018年,网络上曾出现一篇题为“大学助学金,能不拿就不拿,有的人会‘后患无穷’”的文章,其中提到很多申请助学金的乱象,比如曾有高校班集体造假,选出几个人将助学金放到其名下,等钱发下后,全班一起花掉。

“对于下发的资助资金,校内的消费情况我们容易了解,但是校外消费情况却很难把控。”蒋亚楠表示。国家政策是要解

决贫困学生的经济困难,但如果拿到助学金的学生不做此用,长此以往,国家助学金的作用就会荡然无存,也会诱发其他同学的不满情绪。

“我希望有更多有需要的学生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将资助用在刀刃上。”蒋亚楠说。

针对补助款项监管难的问题,高岭也表示,目前资助款项都是一次性打入学生账户,一些学生对于如此一笔“巨款”不知道怎么花,也就很难避免出现一些错误性消费。对此,他建议可以将助学金分几次发放,避免学生拿到钱后产生挥霍心理。同时,在不影响学生学习的情况下,也可以让学生通过参加学校劳动等方式获取。通过这样的做法,也可以让一些并不贫困的学生放弃申请。

然而,不论是分期发放助学金还是勤工俭学,现阶段,高校都没有自主权。因为,助学金款项的金额和方式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高岭担忧,这样是否会让学生形成“社会服务于我个人”的“利己心理”,而忽略了“我也要回馈社会”的责任。

“如果国家给高校在助学金的使用上留有更多空间,高校就可以根据学生情况,让其通过劳动换取补贴,这将更有利于学生人格的塑造。”他建议,国家应该在宏观上进行把控,在政策层面规定资金的用途,但下拨后学校如何利用则应该放权给学校,至于资金使用的监管情况,国家或可委托第三方机构。

“如果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高校将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让助学金的使用和发放形式更加多样化,从而发挥贫困助学金的最大效益。”高岭说。

国内高校首个5G应用示范基地建设启动

本报讯3月7日,“天津大学——大唐移动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5G应用技术研讨会”在天津大学举行。天津大学副校长王树新和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移动)副总裁于继龙,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据悉,校企双方将依托天津大学无人驾驶交叉研究中心,就5G技术和智能网联技术,在前沿技术探索、联合人才培养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战略合作。大唐移动将支持天津大学建立5G技术试验基地,这标志着国内高校首个5G应用示范基地建设正式启动。

在签约仪式上,于继龙表示,在未来,大唐移动将充分发挥5G技术及其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与天津大学在智能网联汽车和智能制造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双方将共同研发满足行业需求的新技术,并为行业培养一流的多学科交叉人才。

王树新介绍了天津大学的学科布局、新工科建设方案以及对交叉学科领域建设的重视和支持,并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的5G应用技术在国际层面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

在研讨会上,天津大学相关科研人员介绍了天津大学在无人驾驶汽车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来自校企双方的参会人员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结合现阶段具体情况和阶段性目标,明确了将开展的后续工作。

(马天明 陈彬)



3月11日,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党员师生在校园带头植树。浙江农林大学是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每年植树节前后学校都会举行各种形式的植树活动,党员师生们更是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绿化家园,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理念,助力绿化事业。 本报通讯员陈胜伟摄影报道

诺奖得主格拉肖走进安徽工大

本报讯近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之父、哈佛大学教授谢尔顿·格拉肖到安徽工业大学作学术报告并受聘该校荣誉教授。

谢尔顿·格拉肖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主要创建者。1979年,他因“对统一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弱中性流的预言”,与阿卜杜·萨拉姆、史蒂芬·温伯格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讲座中,格拉肖介绍了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经历和成就,以及粒子物理研究带给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and 认识。他以世界粒子物理研究为主线,介绍了从1930年泡利预测中微子开始一直到21世纪近一个世纪的粒子物理研究历程,分享了他 and 各个不同阶段粒子物理研究发展的关系。演讲中,他还介绍了偶然发现和机遇在科

学进步中的影响和作用,揭示机遇和智能设计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关系。

格拉肖告诫与会青年学子,在确定目标后,要抓住机遇,要明白真正的学习应该是非功利性的,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兴趣并为之努力;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坚持,不断突破自我;要认识到自己的爱好是什么,因为你的爱好就是你的驱动力,能使你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汪盛颜)

简讯

南开大学启用实验动物中心

本报讯日前,历时六年规划建设南开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正式揭牌启用,该中心将立足南开,服务天津,辐射北方地区的相关研究需求。

该实验动物中心位于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2014年9月主体结构封顶。建成后,中心将能够支撑南开大学医学院、药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化学院和药物化学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教学科研的持续发展。据介绍,该中心除了基本的实验动物饲养外,还将进行很多高尖端辅助生殖、转基因动物等研究。(吴军辉 郭紫)

西部九校联合启动建筑类毕业设计

本报讯近日,2019年西部九校建筑类教学联盟联合毕业设计活动在西安交大开幕。

西部九校建筑类教学联盟联合毕业设计活动发起于2016年,参与成员包括西安交通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

该联盟以“自愿、平等、共赢”为原则,目的是促进西部地区高校间的学术交流,解决西部城乡人居环境关键问题,共同提高本科教学水平,共享教学资源,拓展学生的地域视野。今年联合毕业设计的题目为“西安纺织城工业遗产区的保护与再生利用设计”。(陈一凡)

大连理工举办工程制图教学工作坊

本报讯近日,由教育部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辽宁省图学会联合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共同开展的“基于慕课+翻转课堂的工程制图混合式教学”工作坊在该校成功举办。来自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77所高校148名教师参加会议。

会上,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工程图学教学团队,以及广东海洋大学相关教师分别就工程图学发展趋势以及在线课程与翻转课堂建设与实践等进行了主题报告,并就素材和授课视频制作、PPT高级应用等方面为参会人员进行了培训辅导。

据悉,大连理工大学在制图课程中长期坚持教学改革,并在教材和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杜佳 陈一凡)

记者快评

“对于现在西部高校的人才流失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这并不是今年两会上,笔者向代表委员提出的问题。反而是在一次采访结束后,一位来自西部高校的人大代表,给作为采访者的笔者抛出的问题。言语间,这位代表的语气多少有些无奈。

面对持续的人才外流现象,西部高校的尴尬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继去年两会上,“孔雀东南飞”现象引发代表委员的热议后,今年两会依然有代表委员对这一问题忧心忡忡。对此,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作出回应,教育部正在考虑制定规范,要求西部高校的人才在离开后,要将“帽子”留下来。

人可以走,“帽子”留下,从这一举措中,我们不难看出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治理西部高校人才外流现象的迫切心情,但在这份心情的背后,我们似乎也能很明显地品出一份无奈,甚至是无力感。毕竟在2017年,教育部已经针对该现象出台了多份文件,各级领导也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对西部人才手下留情,然而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既然阻止不了你离开,不让你带走一些东西总可以吧!

然而,面对目前中西部高校之间在财力和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在西部地区丢下的东西,在东部就没有办法得到补偿吗?哪怕是一顶帽子?

纵观近两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对于西部地区人才外流现象所制定的制度,其本质上都是在给人才从西部流向东部设置障碍。比如2017年1月,教育部发布通知,明确指出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高校之间不得片面依赖高薪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2018年9月,教育部出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中也规定,东部地区高校不得招聘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人选。从国内其他高校招聘长江学者候选人时,需由候选人工作单位出具同意函。

从这个角度上说,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的“人可以走,‘帽子’留下”的措施,本质上并无新意,依然是在为人才流动设障。然而,流传千年的“大水治火”的故事早已告诉我们,对于可以流动的物体,“堵”是没有用的,无论是洪水的流动,还是人才的流动。

在“堵”难以见到效果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转换一个思路。比如,是否可以缩小乃至逆转东西部的“落差”,让人才流向东部的“势能”降低乃至消失呢?

需要强调的是,近些年来,国家对于西部高校的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政策支持,即使有资金的投入,其对象也集中在高校层面。然而,这笔钱是否能够落实到改善高校人才,尤其是高水平人才待遇的工作中,其实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

换言之,虽然国家对西部高校进行了大量的帮扶和投入,但高校基层人才生存处境的改善程度,或许并不如看上去的那样“美好”。这很可能是东西部人才吸引力落差如此大的真正原因。

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曾建议,由国家联合地方政府成立人才专项联合基金。除学校给予特别薪水待遇之外,再由专项基金为人才补上与东部沿海高校相对应的差额部分,让本来愿意到西部工作的人才,不会因为待遇问题而最终选择东部。相比之下,这样的思路或许更能解决西部高校高水平人才面临的实际问题,并最终起到遏制人才外流的作用。

『留下帽子』能否『留住人才』

■陈彬

(上接第5版)

中西部高校高质量发展计划项目国家应建立

二是在国家原有综合能力提升计划、基础能力培养计划的基础上,设立支持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的“中西部高校教育教学信息化示范专项”,探索、改革、示范教育教学的信息化手段、环境及资源建设,推动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

三是针对当前中西部高校面临的人才流失问题,有必要实施“中西部高校人才队伍能力提升专项”,支持中西部高校现有人才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为建设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推动中西部高校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希望中央财政加大对陕西省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促进陕西省由高教大省更快转型为高教强省,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基础和智力保障。

组建雄安新区应探索新办学模式

同时,强化“科教融合”是顺应新时代的必由之路,也是新一轮改革浪潮的重点。雄安新区应进一步完善依托高水平研究基地的人才培养机制,积极联合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共建产业创新中心,联合承担重大科研任务,建设专业化、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智库;加强学科群的独立研究院建设,围绕国家关注的重大课题、国际尖端领域及全球问题,组织跨学科研究院,为跨学科科研活动与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平台和组织保障。

此外,实践证明,与世界一流大学联合办学既能借助一流大学的品牌影响力吸引集聚高端创新要素,又可以借鉴利用其国外母校先进成熟的办学理念、模式和经验,迅速提升办学水平。截至目前,我国现有的9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全部位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以中外合作方式创办雄安大学,能够大力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如果以公办为主,则应加强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开展实质性合作,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进国际协同创新,以开放促改革,激活高等教育体制,提高大学的活力和办学质量。

学科评估应分类分地域进行

那些排名在后1/3的学科,因为难以“上榜”,在校内与其他学科的竞争中,自然处于下风。但问题是,这样的学科却常常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学科,本校没有其他学科可以替代,也很难从其他省市学校得到替代。

除学科评估外,学校之间的比较也大多不论学科性质,仅仅以所谓A、B、C级学科数量论英雄。更重要的是,当前学科排名在国家、省(市、区)和学校层面,实质上已经与资源配置挂钩。在此种导向下,学校的管理者本能地把提高学科排名摆到首要位置,采取重金挖人、整合学科等非常规手段,集中资源建设少数学科。

这种做法要么会导致学科虚胖,要么会导致学科体系碎片化。长此以往,打基础、谋长远的事就会被忽略,大家都奔着标志性成果去,谁还愿意难以“冒泡”的事呢?

对此,我建议国家应分类分地域进行学科评估。比如,对于农学等专业,按学科性质就可分东西南北中几个大区,并分别进行评估。在评估中,对相关学科在服务地方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能力和成绩等给予更高的权重。

同时,我们还应引入学科群的概念,即评价某一学科时,要考察其紧密相关的其他学科。比如评价作物学科,应同时考察农业环境与资源学科和植物保护学科,保障学科群均衡发展。

此外,学科评估部门在对特定学科提出建议时,应明确指出该学科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性和贡献度,明确给出是否支持建设及支持程度的意见,以指导所在学校正确运用评估结果。